

一、研究背景

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农业户籍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流动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复杂的形成机理，其特点是劳动者户籍身份没有改变，但工作性质已从农业生产转变为非农工作。这种流动与永久性迁移具有本质差异，使得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经济学家早就相信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非农部门流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之一(Lewis, 1954)。市场化改革以来，农业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已做出了多大贡献？它在将来是否仍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之一？学者们在这些问题上还没有取得一致结论。这与测算方法和数据处理存在差异以及分析时段各不相同有关。很显然，如果不能对这些问题做出肯定回答，那么测算结论既难以用于检验理论命题，又不宜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另外，如果认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农业劳动力流动仍关乎“中国奇迹”之延续(蔡昉, 2013; 都阳等, 2014)，针对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给出客观测算和科学预测就是一项重要工作。

二、研究思路与基本内容

首先，本文对劳动力流动概念做出界定：特指农业户籍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流动。这种流动与永久性迁移具有本质差异，使得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鉴于永久性迁移者数据不完备，以及这类劳动者已深度融入与其身份相符的社会经济生活，本文不再单列讨论。这样一来，文中农业劳动力流动就可与现有文献多所论及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接起来。其次，本文在劳动力配置效应经典公式的基础上考虑两类劳动异质性，除质量异质性外，还对劳动的制度异质性做出模型化处理并给出经验证据。然后，文章给出农业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近似测算公式。与劳动再配置效应经典公式相比，这个公式具有比较优势。最后，实证层面上本文发现，农业劳动力流动对中国1985—2011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出递减的趋势，与经济增长具有相似的波动特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农业劳动力流动仍具有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三、主要结论

本文针对农业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二元经济结构和增长源核算框架下给出新的度量和结果。研究发现：(1) 采用劳动再配置效应经典公式评估这种贡献时，通常会产生漏测或过测。在马塞尔增长源分解模式中嵌入劳动的制度异质性，可以得到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近似测算公式。(2) 1985—2011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递减的趋势，与经济增长具有相似的波动特征。(3) 市场化改革以来，由于非农部门劳动的制度异质性被固化和农村劳动力教育增速放缓，农业劳动力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受到

了抑制。(4) 实施相应制度创新之后, 农业劳动力流动仍可为延续“中国奇迹”做出贡献。

四、汇报点评

基于民工劳动与市民劳动存在异质性的基础上, 本文展开模型讨论, 由模型可知决定劳动再配置效应方向的是民工劳动增长率与劳动总量增长率或农业劳动增长率之差, 可以发现在劳动总量变化情形下, 引起劳动部门结构变化的既有农业劳动力流动因素, 又有劳动总量或农业劳动变化, 后面的部分会导致我们按劳动再配置效应测量流动劳动力对经济影响产生误差。在本文提出的办法中, 我们首先估算新增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再计算实际非农业产业中农业劳动力的总贡献, 相减之后得出流动农业劳动力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阐述的重要观点就是除了流动的农业劳动力人口外, 民工劳动增长率也是重要一环, 根据文中测算, 当我们将 9 年义务提高至 11 年时, 民工由于教育而导致的劳动增长率提高可以导致我国 GDP 每年上涨 0.07%-0.08%, 且这一状况随经济发展而放缓。一直以来三农问题在我国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本文通过缜密分析最后推算得出流动的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也是让我感觉到受益匪浅。